

『军歌之父』郑律成

□ 李 军

郑律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大量音乐作品的著名作曲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曲作者。郑律成也曾是朝鲜劳动党党员，是《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对此，中国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唐诃评价道：“两个国家的两首军队进行曲，均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郑律成毕生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不懈奋斗，创作了近400首音乐作品，被誉为“军歌之父”。

延安铸就的革命作曲家

1914年郑律成出生在朝鲜半岛南部全罗南道光州（现在韩国的光州市）杨林町，原名富恩。当时，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殖民地。郑律成的父亲是位爱国主义者，在其影响和支持下，郑律成的三位兄长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哥和二哥均是中共党员，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郑律成19岁时跟随三哥来到中国，当时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了“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郑律成进入该校学习。毕业后在南京鼓楼电话局做情报工作，监听、搜集日本人的情报。为更好地掩护身

份，组织上资助他去上海学习音乐，其音乐才华开始崭露头角。

国破家亡的悲痛和中国的抗日烽火使郑律成日趋成熟。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即朝鲜人民的胜利。他痛恨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与日本侵略者，同时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延安能给中国带来希望、光明和力量。他敬佩中国共产党，敬佩毛泽东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创举。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称赞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年轻的他决心到延安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在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的资助下，郑律成背着小提琴和曼陀铃，还有《世界艺术歌曲选》和《世界著名歌剧选》，奔赴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成就音乐人生的地方。

1937年10月郑律成抵达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他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1940年是他音乐创作的鼎盛时期，他认为其音乐作品系延安这一抗日圣地所造就。众多有影响的作品问世于该时期，如《延安颂》《延水谣》《寄语阿郎》《生产谣》《黎明曲》《草原曲》等，描绘了艰苦朴素却又生动活泼的延安生活。其中最富代表性、最受欢迎的是《延安颂》和《延水谣》。

不过，延安时期他更多创作的还是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在郑律成看来，若不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不写部队，不用音乐来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时代，就会使音乐史留下一大空白。他创作了《保卫大武汉》《十月革命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等，最著名的是《八路军大合唱》。这部作品由《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等八首歌曲组成，又属《八路军进行曲》流传最广。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这首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1988年7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确定该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为朝鲜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创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顿时沸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律成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他的夫人丁雪松坚定地对他说：“你为我们中国的抗战而战斗，现在该轮到我为朝鲜的独立而战了。”经中央批准，他们离开延安一起远赴朝鲜。抵朝后，丁雪松历任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等职务。郑律成的组织关系也从中共党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全身心地投入筹建人民军协奏团。1945—1950年，郑律成历任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他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军民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图们江》大合唱等十余部作品。他还改写了在延安时写就、未及演出的《抗日骑兵队》大合唱，在平壤和朝鲜其他地方演出并广播了200多

场次。

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样，成为了朝鲜人民军军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正是这首激昂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鼓舞着人民军将士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打败美帝国主义。在前线炮火声的伴奏下，郑律成又为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谱写了《共和国的旗帜迎风飘扬》《战士的誓言》《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有一张郑律成在前线坑道里创作音乐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

加入中国籍再创音乐辉煌

1949年10月中国与朝鲜建交。丁雪松通过中国驻朝使馆给周恩来写信，称在朝工作5年，对国内情况已很生疏，希望回国学习；同时提出郑律成与她一道回国、转回他的党籍以及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很快作了批复，并亲笔致函金日成征得同意。金日成十分大度地说，“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培养了那么多干部，现在要一个郑律成，不成问题”。在两国领导人关怀下，郑律成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并加入中国国籍。

回中国后，郑律成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为寻找新的创作素材，他深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长期到农村、工厂、林区、营房体验生活，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到1964年，郑律成创作了200多首音乐作品，题材极其广泛：有讴歌工人的《采伐歌》，赞美农民的《幸福的农庄》，也有歌颂解放军的《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前进，人民空军》等；有写给儿童的欢快明朗的歌曲《和平鸽》《快乐的童年》等，也有涉及国际风云的乐章。

晚年，郑律成又倾注全部热忱，以十年辛劳，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等数十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些力作深切表达了郑律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一宏大工程也是他取得的最后一个音乐艺术高峰。

1976年12月郑律成病逝，享年62岁。他留下的宝贵音乐财富，今天仍然是激励我们不断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2009年，哈尔滨人民音乐家郑律成纪念馆落成，在“军歌嘹亮”展区的一面墙上写着：他是不戴军衔的战士，是战士冲锋的号角。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刘鸿生：“作为中国的实业家，我真真正感到骄傲”

□ 赵 晋

轮船招商局转亏为盈，并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沿海航权。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后，刘鸿生不惜生命和产业的危险，顶着日军军部的软硬兼施和威逼利诱，坚决拒绝“合作”，反而利用包括与德国商人的密切关系，穷尽可能将其在上海的产业撤出，随国民政府迁往后方。刘鸿生在西南、西北等敌后地区创设了包括火柴、毛纺、水泥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厂企业。刘鸿生在大后方的土地上，依靠自身的办厂经验，既实践着他的实业抱负，也为全民族抗战提供经济支持。

（二）

抗战结束后，刘鸿生带着创办实业的梦想返回上海。返沪之后，刘鸿生极力维持和扩大刘家工厂的生产经营。然而，官僚资本的排挤，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对刘家的大幅勒索，使得刘鸿生“对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信心”。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刘鸿生在香港。在香港的半年时间里，刘鸿生审慎地进行着观察、思考与选择。此间，身处上海的家人不断写信告知刘鸿生解放军到来后，上海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新政府的爱国、朴素、讲道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都给刘鸿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各方面的信息和劝说打动了这位企业家的家心。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鸿生终于在1949年10月底作出决定，重返大陆，在新中国追求实业梦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留在大陆的工商企业家并不很多，而在留下来的企业家中，刘鸿

汉光武时清官多

□ 路向军

东汉光武时，清官辈出，形成了光武清官集群，为后世树立了“贤德爱民，克己奉公，执法公正，清廉勤慎”的清官懿范。光武朝涌现的清官集群是贤德、贤能、爱民、为民制产的懿范。如杜诗担任侍御史（六百石的县级官员）时冒死诛杀奸淫杀掠的将军萧广，担任南阳太守“政治清平，省爱民役，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他还有两件在科技史上重要的发明——“水排”和“水力鼓风机”，这两件器物提高了冶铁效率和农耕效能，使南阳郡内“比室殷足”，后经推广而惠及九州。钟离意任会稽督邮时，郡内暴发瘟疫。他精通医药，孤身入疫区，治办医药物资，抚恤救治灾民，活人无数，救助百姓渡过了这场灾难。还有任延，他在任职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时，九真人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又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夫妇之道。任延教授当地人制作农具和耕种，百姓学会农耕后，不再饥荒；他又为当地人立婚嫁等礼法，九真人始知种姓。“克己奉公”成语即源自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之九的祭遵。祭遵立下赫赫战功，拜将封侯，一生清廉守法，极为简朴，和夫人布衣粗裳，得到赏赐都分给士卒，不治产业，家无余财，史评其“克己奉公”。光武时官员多清廉勤慎。大败匈奴并缔造“渔阳惠政”的张堪一生清廉如水，平定西南时任蜀郡太守，负责接收公孙述堆积如山的宫储珍宝，毫无所取，离职时“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前文提到的杜诗，造福一方惠及万民，自家却无房无地无产业，病卒于任上，竟然“丧无所归”，还是鲍永上报朝廷，朝廷才得知消息。光武帝下诏在其郡邸为杜诗治丧，并赐绢千匹。经新莽战乱，汉光武帝再统一中国时，西汉末年的7000万人口已十存其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饥荒灾疫共生，社会秩序混乱；外部有匈奴、西羌及依附匈奴的卢芳等割据势力的威胁侵扰。内忧外患，都要求新建的东汉政权励精图治，尽快复兴经济，外御强敌。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及其群臣确实把握了机遇，共同创造了中兴局面。当时产生了这样的清官集群，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统治集团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光武帝自身就是大学生，称帝后也学习不

懈。在东汉开国的功臣中，不惟文臣多硕儒，带兵的将领也多是饱学之士。如“云台二十八将”中，邓禹、贾复、耿弇、冯异、寇恂、祭遵、朱祐、李忠等，皆修习《尚书》《道德经》《春秋》《礼记》《诗经》等经典，有的还治学有成。刘秀选用的儒，是志美行厉的真儒，而非寻章摘句的腐儒、言煌行秽的小人之儒。以两位被儒门称为圣童的人物为例：张堪少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让与族人，自己精心励志到长安求学；任延12岁即明《诗》《易》《春秋》，19岁被拜为会稽都尉，薪俸用于赈济贫孝。这样的人为官，便多能遵其所学，治国治民先治身，成为用人格修养去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清官。

进步的执政理念。光武朝廷固为刘氏家天下，但认为国家须“以元元为首”，即以民众为第一位；光武帝又长于民间，颇达情伪，知道稼穡艰难，百姓疾苦，他的功臣集团和选用的官员也大多起自民间乃至底层，能广求民瘼，在一定程度上施政为民。曾为佣工的卫飒去做桂阳太守，见一些地区民众仍居于深山溪谷，道路不通，便凿山通道500余里，郡民得以交通往来。范充继任太守，见郡民还缺衣少穿，赤足天寒割裂十分痛苦，便教郡民种植桑拓麻纰、养蚕织履（麻鞋），使民众能够穿衣避寒。

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刘秀穿粗布衣，宫殿无重彩，手不持珠玉之玩，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进献珍宝美食，慎终如始。因此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不搞政绩工程，臣下有奏报祥瑞、歌功颂德的，一律不纳。如任延刚正，光武帝也曾出于爱惜而劝诫他：“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说：“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

轻刑简政，轻赋薄役。光武帝大力简政以减轻百姓负担，裁并了400余县和若干郡国，官吏数量减少近一半。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两级。官级少，郡守或国相与中央九卿平级，内征外调灵活，官员肯安心行政，务实为民制产。文书也务从寡简，乃至减少了十分之九。光武帝吸取西汉武帝和新莽“法网严密、国无廉士、家无完行”的教训，下诏废除了汉武帝和王莽时的严苛刑法，以宽刑轻法代之。轻刑简政，轻赋薄役，务求安静与民休息，加之较严谨的监察和政绩考核制度，便少予蠹虫贪腐之机而多生清廉循吏。

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在政府贸易部门的扶助下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刘鸿生曾下苦功研究过毛纺工业各个生产环节的关键性问题，得到了“毛纺迷”的称号。1953年12月，12万公尺高级呢绒，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字商标，进入国际市场，受到国外顾客欢迎。刘鸿生笑逐颜开地说，“作为中国的实业家，我真正感到骄傲。党和政府替我实现了几十年没有实现的心愿，我真正受到鼓舞！”

（四）

1954年9月，刘鸿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也听到了刘少奇副主席关于中国第一个宪法草案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的工作报告，这使他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没有开完会就提前回上海，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政务院发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就更坚定了刘鸿生的决心。1956年年初，刘氏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有朋友问刘鸿生舍不得不得。刘鸿生笑着讲了一番道理，其中的一段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我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可是，在旧社会，我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部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一扫而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中国工业化了，我感到的只有骄傲和幸福，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刘鸿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因其开办的煤炭、火柴、毛纺、水泥等产业皆属行业翘楚，又因其毕生致力于实现企业“托拉斯帝国”的梦想，开办产业之多、涉足领域之广，实业界鲜有出其右者，故又被誉为“企业大王”。

（一）

刘鸿生（1888—1956年），祖籍浙江省定海县，出生于上海。其父刘贤喜曾做过轮船买办，颇有积蓄。刘鸿生7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1905年刘鸿生考入圣约翰大学，次年辍学。其后的两年里，他先后在租界工部局担任教员和翻译，1909年凭借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等人的介绍，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做推销员，由于推销煤斤很得力，深得英国人赏识。后来，刘鸿生创办自己的苏州鸿生火柴厂、福泰煤号和上海水泥厂。从此以后，他投身实业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一座座工厂、一家家企业拔地而起：1926年创办中华煤球厂，1927年成立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华保险公司，1929年开办华丰搪瓷厂和章华毛纺厂，1930年合组建立大中华火柴公司，1931年组建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和隶属于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东沟梗片厂。早期实业活动中，刘鸿生最得意的就是创办火柴厂，1934年成为全国火柴业的魁首。刘鸿生倡导火柴业联营，牵头创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声名大噪。

刘鸿生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办一家又一家的工厂企业，首先得益于家族和同乡的支持。刘家兄弟姐妹四人中，刘鸿生与弟弟刘吉生关系最为亲密。刘吉生很早便追随其兄进入商界，长期担任刘鸿生的经营助手，是刘氏企业集团中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刘鸿生的重要成员。刘鸿生的妻子叶素珍，是宁波帮著名大商人叶澄衷的孙女，刘氏早年在实业上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家的扶持和帮助。刘鸿生长期担任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的职位，这使他可以紧紧依靠素以金融见长的宁波帮同乡的鼎力支持，网罗人才、积蓄资力、开拓市场。1930年代初，刘鸿生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负责改革轮船招商局。在他兢兢业业的努力下，

更令刘鸿生高兴的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这一年，刘氏企业普遍有了好转，特别是